## 近三十年來明清鼎革之際軍事史研究回顧\*

#### 李華彦\*\*

明代軍事史的研究領域著作甚多,主題多圍繞著明初的軍事制度和衛所發展,研究 趨勢有兩種:單一議題如城堡、兵制、馬匹等,通論性如研究整個明代的軍事建置、 九邊體系、戰略戰術等,而結合軍事、財政、人物、武器技術等各領域史料,呈現短 時段明代軍事史的概況,是值得嘗試的新方向。明清鼎革之際的東亞局勢,因明清戰 爭而劇烈變動,明代的軍事與財政都因為這場戰爭而重新調整,軍隊與糧餉的補充也 因實際需求而備受重視,但目前這些議題的研究深度尚待加強,是值得明史研究者開 發之處。

關鍵詞:明代軍事史 明代財政史 晚明 研究史

<sup>\*</sup>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及三位修正文字委員之意見和指教。 \*\*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 前言

明清鼎革是十七世紀前半葉的大事,長城沿線的明朝北疆逐漸陷入烽火,軍事議題成為朝廷要務。位居長城東段的遼東半島,從萬曆後期開始,也隨局勢演變,成為全國矚目的軍事要地,導致此地成為朝政首要關切的原因,是供應山海關內外軍隊用度的「遼餉」。遼餉這份龐大的國防支出,亦開啟晚明三餉先河——自明朝十五省收入北京國庫的大部分稅賦,盡數轉運北邊軍鎮,供邊防支出。<sup>1</sup>

天啟朝(1621-1627)以後,明朝失去遼東絕大部分土地,遼餉更成為抗金的重要支援,用以整建北直隸、寧錦、遼海三大軍區,但也因崇禎朝薊遼兵變等情而耗盡,促成明朝覆滅,造成財政和軍事狀況都「千難萬難,真可痛哭流涕」的景況。<sup>2</sup>明清鼎革期間的諸多遼東人物、史實,近有閻崇年、陳捷先等名家寫作不少書籍介紹,<sup>3</sup>藉由諸多影視作品傳布,獲得華人世界廣大迴響。然而,現有研究多集中於晚明薊遼主事者、財源軍餉、兵民問題等議題,綜合運用相關史料並就單一重大議題或事件進行整體討論則較少見。此外,經世致用之學在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興起並盛行,與當時明清戰爭需求許多實用的技術知識,關係密切,這點亦較少受到研究者矚目。

明朝後期的三大財政支出,是官俸、軍餉和宮廷靡費,而主要經濟來源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 311。范傳南,〈明代九邊京運年例銀及其經管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頁 21-58。

<sup>&</sup>lt;sup>2</sup> 洪承疇語,參見〔明〕畢自嚴等,〈防禦戰守等事〉(崇禎六年正月初二日), 收入〔明〕佚名,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部編,《崇禎存實疏鈔》(北京:線裝書 局,2004),頁100。

<sup>。</sup> 閻崇年,《天命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正說清朝十二帝》(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袁崇煥傳》(北京:中華書局,2005);《明 亡清興六十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杜家驥,《皇太極事典》 (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李治亭、林紅,《皇太極皇帝軼事》(太原:山 西經濟出版社,1993)。陳捷先,《皇太極寫真》(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

的田賦,到此時已無法支應明朝全部的財用。<sup>4</sup>這狀況正由對抗滿洲過程顯現出來,明朝最後三十餘年政務的一大部分,便聚焦於軍事議題,軍需糧餉則一直是財政上的最大支出。晚明的加派糧餉原非正稅,但自從攤派於各省田賦之後,就未曾取消,而崇禎時期的各次兵變和內外戰爭又使得餉用劇增,故晚明軍事史,實與當時的財政史形成一體兩面。研究十七世紀前半葉明清交替時期的學者,或多或少都須注意當時軍事和財政間的密切關聯性,及兩者對民生的影響。

本文一方面回顧近三十年有關明清之際軍事史的研究成果,指出研究趨勢的變化;另一方面筆者想強調研究軍事史者,還可以從明清兩國在軍事和 財政上長期進行較量的角度,深入探討明朝的戰略得失和社會變動。

#### 一、傳統明清之際軍事史研究成果

傳統明清改朝換代之際的軍事史研究中,南明史專著占重要地位。南明 起於崇禎十七年(1644),清軍入關與大順軍、南方明朝諸軍競逐中原統治權, 終於桂王朱由榔(1623-1662)殉明的永曆十六年(1662),或清朝康熙二十二 年(1683)臺灣鄭氏政權降清,前後約二十至四十年。在這段期間,中國大多 數省分戰亂不斷,各勢力間的戰事發展與相關軍事議題成為時人與後世史家 關注的焦點,故或可將「明清之際軍事史」視為南明史的主要面向之一。

關於南明史最早的通論性著作,是1957年謝國楨出版的《南明史略》。 本書敘事起自明崇禎元年(1628)陝北農民軍王嘉胤起事,終於清康熙帝征服臺灣鄭氏,以農民起義、階級鬥爭、民族戰爭等角度觀察晚明至清的長年戰爭史。謝國楨分析南明時期中原三大勢力的成敗原因如下:南明衰於諸王無能、各省政權和內部大臣互不合作,以及諸政權奠基於不同軍系之上,受武人挾制,缺乏自主能力;農民軍起事終歸失敗,原因在於攻下北京之後內部分裂,未警覺遼東清軍的動向,缺乏新進領導層和詳細戰略,且因剝削京城

<sup>4</sup> 王春瑜、杜婉言編著,《明代宦官與經濟史料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204。

紳民商賈過厲而失去民心;清軍成為最終的勝利者,是因為軍事組織嚴密,而且在關外時期就長年有計畫地積累物資並加深自身文化,加上清朝領導層數代從事戰爭,軍事經驗和政治知識豐富,所以軍事決策和用兵速度均超越明軍和農民軍。<sup>5</sup>

謝國楨《南明史略》在此領域屬開創之作,羅列許多十七世紀明清之際 的戰爭,雖建立起研究綱要,但未能深入研究多場戰爭的史實,諸如比較對 戰雙方在戰備、策略、布軍、兵力等方面的差異,故於軍事史上,諸多相關 人物和數據都還有研究空間。

《南明史略》之後,關於這段史實的綜合論述,有美國司徒琳 (Lynn A. Struve)的《南明史:1644-1622》。本書篇首有17幅特別製作的南明諸王、李定國 (1620-1662)、鄭成功 (1624-1662)、大順李自成 (1606-1645)和清軍等部移動圖和戰線圖,清晰呈現此時期內各方軍事力量的混戰過程,敘述戰爭和戰術甚詳,頗具參考價值。司徒琳指出南明屢陷困境,源於制度的缺陷。明朝倚靠武力建國,政權鞏固後,改以文官為統治基礎,但初期即因廢除丞相而使文官體系失去制衡皇權的合法性,後來又遭宦官系統分權、壓制;軍事體系上,武勳後代日益驕縱、怠惰,遍布各地的宗室藩王普遍缺乏領導力,無法達成鞏衛中央的目標;基層士兵則出身低微,衛所財源窘迫,在在弱化軍事體系地位,使其遭受輕視。另有文武官員始終無法統一和協調、大臣如何輔弼皇帝出現法統問題等兩大難題,導致明朝政務運轉存在裂隙,迄國勢危亡,社會不安與混亂驟然加劇,縱然南明勢力和版圖比清軍和大順軍大,黨同伐異、意氣之爭卻較晚明更烈,終於在文武官員和各王軍事力量分散的狀態下,南明各政權宣告結束。6

南炳文的《南明史》與司徒琳書同年出版,亦是通論性著作,主要敘述 南明弘光至清朝康熙收臺灣期間的各軍事勢力爭戰的史實。本書對於南明諸 王、張獻忠(1606-1647)、李自成、鄭成功及鄭經(1642-1681)等政權的內部 史事,探究較前人詳細,但將清朝入關與殲滅各方軍事勢力的過程視為從屬

<sup>。</sup>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司徒琳著,李慶榮等譯,《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地圖 1-17;〈引言〉,頁 1-17。

角色,不在主述範圍。本書因研究主軸明確,章節主角分明,故能凸顯出作者以南明境內發展大勢為研究中心的特點,並對當時各軍事力量的個別論述更加詳明,如張獻忠經營四川、鄭氏治理臺灣等部分,均有深入探討。<sup>7</sup>作者史觀不偏於此時期的任一方,就事論史,也為本書特色。

其後,顧誠《南明史》與司徒琳有相同見解,即南明對清軍的戰爭落敗 大多出於內鬨、力量分散不互助,而非明軍實力不如人。本書指出崇禎時期 (1628-1644) 明軍已出現戰略失誤。當時,身兼兵部尚書的大學士楊嗣昌 (1588-1641)深知明朝兵力、財力無法同時對抗清軍和農民軍,提議與清和談, 爭取時機先全力安內——對付李自成之農民軍,再行抗清,但未獲採行。後 至南明弘光朝廷,軍備不整、朝臣內鬥激烈,並無戰略可言,甚至因情報不 明,誤以為吳三桂(1612-1678)借清軍助明復興,而有聯清制李想法。在軍事 上,連攻擊目標也不清楚了。在軍事談判上,弘光朝廷也無戰術可言,自己 既沒有出兵光復故土的戰績作為後盾,赴清朝的北使團也無具體腹案,對清 廷想法毫無算計,致使一上談判桌就受制於人,使臣左懋第(1601-1645)更被 扣押。軍事準備上,南明甚至不如晚明,弘光帝倚靠軍閥登位,荒淫浪費, 史可法(1601-1645)等重臣則對軍閥揮霍糧餉束手無策、隨波逐流,凡此皆讓 南明財政疲困、民心惶懼,幾無戰備。後繼的降武帝(1602-1646,1645-1646在 位) 又和魯王 (1618-1662, 1645-1655在位) 持續內鬥, 重複折損戰備實力, 君臣 將相無暇商議完備的整體作戰計畫,各軍系從未整合,終至南明軍事節節敗 退,亡國而已。

關於清朝方面的戰略,顧誠得出多爾袞(1612-1650)善用明朝降將、迅速接管各省,並在入關後改變進軍方向,讓多鐸(1614-1649)部放棄江南,暫留弘光朝廷,直取陝西等地,先鞏固北方軍事成果,再圖南進。清廷當年的決策是很務實的,因其入關與南明和大順軍戰鬥,相較之下兵力終究是少數。因此,確認最近敵人、保存滿洲本支部隊的戰鬥力是首要之務,而清朝最終擁有中原,便是因為決策明快、內部凝聚力強於明朝。不過,清朝在統御新

<sup>′</sup>南炳文,《南明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

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 41-132、252-310。

收領土上策略錯誤,對新降漢人強行民族壓迫政策,如剃髮、易服、圈地、 投充,違背漢族傳統風俗,悍然減損民眾身家利益,亦激起漢民強烈抗拒, 延長其統一中原的時間,耗費偌大兵力。<sup>9</sup>

關於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戰略,顧誠指出他們缺乏正確的軍事判斷,入北京後,未意識到新敵人——清朝的存在,及其與己爭天下的決心。不事收服人心,反而積極追贓助餉,開罪新附的縉紳地主,失去收納大批民力、資源為己用的機會,又失策地將大順軍主力分散於西北、湖廣、山西、山東等地,未集中調至北京新根據地保衛,且過於輕信吳三桂等明朝降將,不以自己人取代其職務,施行監控,最終只能倉皇逃出北京,回復為流寇。

崇禎十七年最重要的戰役,是四月底的山海關一仗,李自成事先未擬定 鎮密戰術,臨到敵方迫近才急率重兵十萬至關,倉促面對五萬吳三桂軍和十 萬清軍的合擊,失敗而歸,大順的歷史也從推翻明朝變成抗清作戰。李自成 等大順領導層在推翻明廷勝利後,對內收服人心和對外抗拒新敵上,戰略均 嚴重失誤,準備不足,因此退居歷史次要角色。<sup>10</sup>

顧誠《南明史》著重在利用和辨正真偽相雜的諸多存世史料,釐清南明歷史,故未附上各種圖資。本書於陳述史事時,採用考據和推理並行的方式,並未盡依史料直接書寫,而是用多筆史料印證同一事件的各面,最終裁定一種合理的事情發展走向,是很謹慎的研究法。此外,本書並列明朝、清朝、大順朝三政權為主角,僅就事實討論三者間的軍事擘劃和優缺得失,史觀不偏袒任一方,對他們軍事策略的分析甚為詳細,很值得參考,也可以視作是一部軍事史專著。

顧誠另有一書《明末農民戰爭史》,專門研究晚明各地的農民軍起事,研究主軸較其《南明史》更專一。本書附錄有「大順政權地方官員表」、「大西政權地方官員表」、「山海關戰役後三個月內官紳叛亂情況表」,清晰呈現晚明農民軍勢力的建制和朝代更替之際的紳民軍事動態,而本書對李自成部先占領湖北、河南、西北數省,再與北線兵力合擊北京的戰略分析甚詳。對

<sup>&</sup>lt;sup>9</sup> 顧誠,《南明史》,頁 132-154、207-251、279。

顧誠,《南明史》,頁28。

於晚明抗拒農民軍與農民軍對清作戰的錯誤軍事策略,本書見解則與前作 《南明史》相同。<sup>11</sup>

有明一代武備的通論著作有: 范中義等著《明代軍事史》,提出嘉靖至萬曆時期(1522-1620),明朝軍事上有很大變化,武器裝備從冷兵器進展至使用火器、軍伍編制從衛所為主演變成募兵和民壯為主、邊海防形成新體制和重點區、兵書大量湧現,這使晚明的軍事力量頗為可觀。然而,本書也分析道,晚明因軍隊日益衰落和屢戰屢敗,導致內外戰事都每況愈下,並且逐漸喪失戰場主動權,終至敗滅。<sup>12</sup>至於更細部的武器方面著作,則有周維強的碩士論文〈明代佛郎機銃研究〉和博士論文〈明代戰車研究〉兩作。<sup>13</sup>

晚明的軍事,和明初、明中葉的規制、背景都不一樣,須與前者區隔後再作探討,才能顯出其特性。首先將萬曆元年(1573)以後視為「晚明」的學者為樊樹志,其大作《晚明史(1573-1644年)》從晚明和世界各國交流的視角觀察,較傳統研究明清交替史的角度更寬廣。此時期的明朝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經濟地位,面臨著地理大發現之後「全球化」開始的階段,既與鄰近的傳統朝貢國貿易,也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國家及其殖民地進行遠端貿易,並且吸引世界三分之一產量的白銀流入中土。文化上,耶穌會等傳教士為明朝帶來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科學、宗教和文化,使中國知識界受到影響。但是,經濟、文化上融入世界的晚明,卻不能化此為助力,反而加劇內在矛盾,從萬曆到崇禎朝(1573-1644)均忙於政治鬥爭,失去革新蛻化之機,終致覆滅而成為歷史。<sup>14</sup>

<sup>11</sup>顧誠,《南明史》,頁 28。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2012)。

<sup>12</sup> 范中義、王兆春、張文才、馮東禮,《明代軍事史》,上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1-5。晚明軍隊孱弱不能戰,當時人也有此見解,說道:「乃自有遼變以來,京將不聞有一員可當推轂,京兵不聞有一隊可效馳驅,根本如此單弱,九邊何所瞻望?」參見[明]陳建撰,[明]高汝栻訂,[明]吳禎增刪,《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卷14,〈太宗文皇帝紀〉,癸未永樂元年四月條,頁224。

<sup>13</sup> 周維強,〈明代戰車研究〉(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明 代佛郎機銃研究〉(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sup>14</sup> 樊樹志,〈導論——「全球化」視野下的晚明〉,《晚明史(1573-1644年)》, 上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1-203。

樊樹志《晚明史》的第九到十三章析論晚明軍事甚詳,細緻地記載明清戰爭與農民戰爭的經過,和明中央和地方、軍隊間的配合。本書凸顯出崇禎帝主導各地軍事任命、大戰略布局的角色,亦陳述文武官間的合作、衝突,對清還是對農民作戰的猶疑等軍事決策,是決定明朝終於被取代的重要原因。<sup>15</sup>本書結合晚明的軍事、政治、經濟發展,綜論其對戰爭發展的影響,比單就軍事角度省思各種明清戰爭的局勢發展,分析起來,更見紮實,書中各種史料的比對運用、斟酌損益,則可作為史學方法的範本。

#### 二、從制度史到結合地方史的研究趨向

傳統明清之際軍事史的研究,與明代政治史多聯繫在一起,分野並不清楚。晚明軍事處於衛所制度毀壞與募軍盛行的轉換期,衛所制度和建設也是明代軍事史最基礎的研究。有關明清鼎革時期戰爭、軍務的研究重點,多在長城沿線的邊鎮,而其成立年代、規制等議題,則是探究這個領域必先深入考察之處。如此一來,明代軍事史便具有地方史的特性。

「九邊」是明代軍事史和北疆經營上的一個重要名詞。嘉靖十六年(1537) 成書的《九邊圖論》系統整理了九邊源由,解釋道:「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從此言可以理解:「九邊」一開始就是明朝為積極防禦北邊蒙古勢力的國防目的而設立,並且一直是北京朝廷直轄的重點機構。晚明的抗清戰爭,只是明軍的軍事行動從長城西段和中段的衛所,轉向東段的遼東臺堡。也就是,「九邊」發展與明朝北疆軍事的經營相始終。

九邊建置起於宣德之前,其所屬十三鎮建立的時間、地點,詳載在《明

<sup>&</sup>lt;sup>15</sup> 樊樹志,《晚明史(1573-1644 年)》,下册,頁 760-1178。

<sup>16 [</sup>明]許論,《九邊圖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九邊總論〉,頁 86。 崇禎時之十三鎮為:宣府、山西、延綏、薊州、密雲、昌平、固原、永平、大 同、寧夏、甘肅、易州、井陘,參見[明]畢自嚴等,〈錢糧百分缺乏等事〉(崇 禎六年正月初四日),收入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部編,《崇禎存實疏鈔》,頁 220。

實錄》中。肖立軍的《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一書詳細考察《明實錄》,整理出明朝邊鎮文官武將、兵種職務和等級區別,並深入分析明軍武器和蒙古各部間的關係,是瞭解明代軍制的重要專書。由於九邊牽涉甚廣,非有限篇幅可盡,因此肖氏另成一書《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擴大前書的研究和史料數量,新增衛所軍戶、軍餉來源等內容,說明應將長城邊鎮都司、屯堡等軍事制度,視同「地方」的里甲、州縣等單位,是明帝國社會單元和組成的常態,而非特殊、獨立於民之外的機構。<sup>17</sup>肖立軍此論點,與本節論點正相符合。

岗立軍兩書,《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敘述九邊財源較略,因此,結論之一的「九邊費財、經濟亡國」,在說明上較缺乏證據,這一點在後一書《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第六章裡獲得補充,該章揀選《明實錄》上記載的數據,統計出明代的九邊餉額,加強說明。肖立軍的兩本書均採分類整理方式,解釋明代財政與邊鎮之間的關連,但對於晚明時期的制度和戰史未多著墨,因此在評論明清交替之際各方軍力的得失方面,還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考證長城九邊各項制度始建時間及沿革的著作,還有趙現海的〈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本書述說建文朝(1398-1402)削除宗室塞王守邊與九邊制獲得強化的因果關係,舉出永樂元年(1403)宋晟(?-1407)出任甘肅鎮總兵,負責全鎮軍務、洪熙元年(1425)寧夏鎮總兵陳懋(1379-1463)佩征西將軍印,證明九邊政策自明初即獲得切實執行;<sup>18</sup>而「九邊十三鎮」之說,則首次出現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sup>19</sup>本書內容止於萬曆朝(1573-1620),依循傳統的制度史模式寫作,先綜合大量關於明代軍鎮制度的中文專著和明人文集、《明實錄》等史料,再列出長段引文說明長城衛所的各項制度及施行細則,資料甚多,但未能理清明代軍事制度的長時段演變脈絡。

<sup>17</sup> 肖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明代省 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sup>&</sup>lt;sup>18</sup>趙現海,〈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頁 69-114。

<sup>19 [</sup>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卷 571,萬曆四十六年六月戊寅條,頁 775。

晚明長城之軍事制度,共計九邊十三鎮,熟悉其地理分劃,是通曉明代軍事策略重心及各堡寨實用價值的基礎。這方面的研究,則可以朝「長城地方史」的方向邁進,將具有明顯區域性質的長城和其軍事體系,與當地的軍事演變過程結合研究,會較易有具體成果。這方面的研究代表作為劉謙的《明遼東鎮長城及防禦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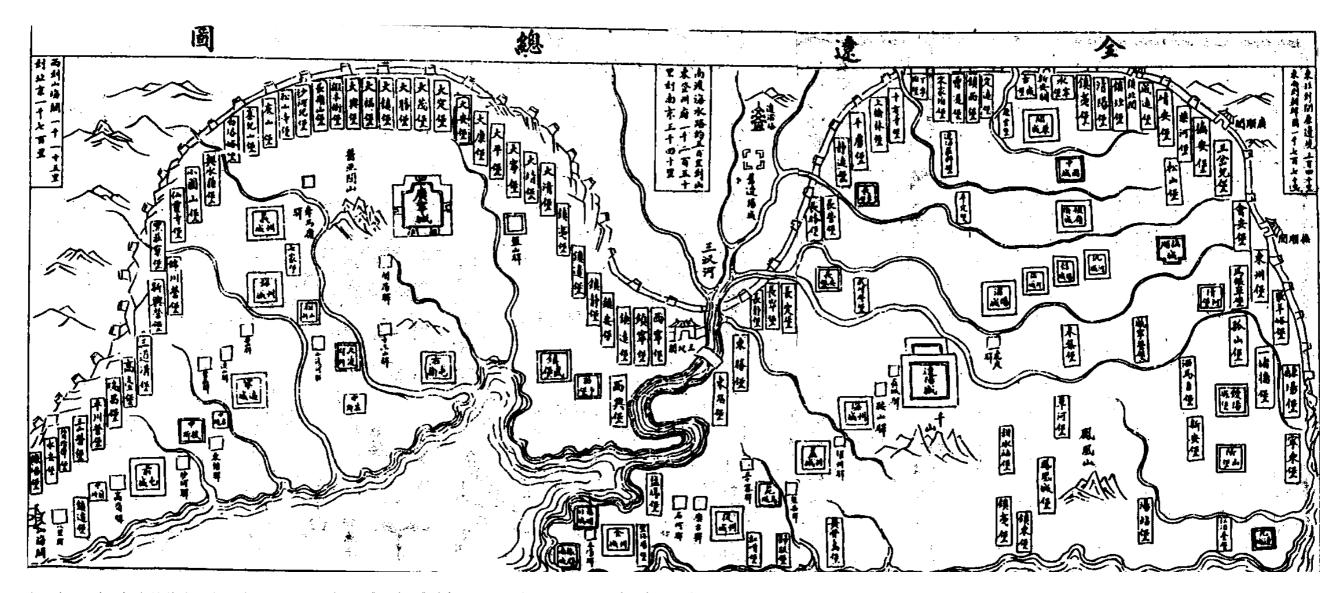
劉謙自1953年起,便以實地調查長城的方式,投入相關研究長達三十多年,他專注於遼東一段,結合古今史料與實地勘察,彙整超過1,000公里的遼東長城資料,包括城牆、臺堡、壕溝、驛站、碑銘等古建築遺跡的測量紀錄和存檔圖片。此外,他又據史料繪製成118幅主題地圖、平面圖,如〈明遼東鎮防禦圖〉、〈清柳條邊(代替長城)圖〉、〈遼東鎮長城城牆的結構圖〉等,標示出大小堡壘、馬市、部族聚落和柳條材質長城等位置,紀錄遼東段長城的實狀,大幅提升研究者對於明朝軍事規劃的理解。

劉謙的地圖資料,至今日仍具重要參考價值,惟原書年久,墨跡掉損不清,筆者以其書圖2為底本,重畫製成後頁的〈圖1 明遼東鎮防禦圖〉,<sup>20</sup>可與〈圖2 嘉靖四十四年全遼總圖〉對照參看,圖1可彌補圖2未照現代地圖規則繪製、在地理相對位置呈現上的不足。圖1中,每一小點代表一個堡寨,由南至北重要城池依序是金、復、蓋、海四州及遼陽,顯示晚明軍事布局,意在逐步向北,伺機進圖被金軍占領的遼陽城。此例證明,地圖可大幅增益對明代軍事布防的理解,解決長篇文字無法表達的困難,在軍事史研究上是很重要的方法。

《明遼東鎮長城及防禦考》一書的學術貢獻,除了地圖資料外,還依據 清光緒十一年(1885)曹廷杰(1850-1926)奉命勘查疆界的紀錄《西伯利東偏 紀要》和混同江東岸特林發現的永樂、宣德碑各一塊,考出清朝官書《滿洲 源流考》的歷史是偽造的,證實「山海關外明朝原就有長城和防禦體系」, 且疆域已達黑龍江流域。另外,本書亦詳加考證臺堡建材、磚質、長寬高數

<sup>20</sup> 此圖亦可視為明軍攻擊部署圖,因其在天啟初遼瀋大敗後,已憑山海關據守,退無可退了,而遼海中各島,紛紛部署伺機反攻的明軍。但本文仍從劉謙原作圖者之地圖名稱。參見劉謙,《明遼東鎮長城及防禦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圖2,〈遼東鎮防禦圖〉,頁6-7間插頁。

#### 圖2 嘉靖四十四年全遼總圖



資料來源:[明]李輔等修,高鳳樓校勘,許麟英撰,《全遼志》(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卷1,頁1。

據、設計者及其考量、海陸地理形勢、物產工業等,寫明長城各址的相關史事、人物、年代、設計源由,頗具基礎史料價值。<sup>21</sup>其他尚有〈遼東鎮二十五衛屯田及糧額一覽表〉、〈遼東鎮各衛鐵場所、鹽場所、及馬市、木市分布示意圖〉等資料,指出明朝時期的山海關外,能夠大規模自產米糧、鹽鐵、馬、木等物品,不需全部仰賴輸入。<sup>22</sup>這些詳細的調查和記載,均使本書成為研究東段長城的必備用書。

莊和峰的碩士論文〈明長城山海關防區防禦體系與軍事聚落研究〉,也專事研究明代的山海關軍事聚落。該論文第四、五章〈明山海關防區防禦體系與構建層次〉、〈明山海關防區軍事聚落及其防禦性研究〉致力探討明代山海關的臺堡設置、生活機能和戰略布防,並輔以現代的地理圖,兼用表格整理衛所、臺堡歸屬,清晰明瞭。<sup>23</sup>不過,該論文對於山海關和明軍的後勤供應系統,以及人事變化的佐證史料,還可更加深入研究,而九邊體系的細節回顧,則可略減篇幅。

在衛所、軍戶方面的專門研究,早期有王毓銓《明代的軍屯》一書,用《大明會典》、《明實錄》、《皇明經世文編》等官書,研究明代軍屯和糧餉的關係,製成〈明代各地區軍屯分地畝數〉等表,統計數據,奠下此領域的基石。王書解釋明代衛所正丁、餘丁、幫貼等人員編制,本含有明代統治者寓勞動訓練於屯田耕種之意,務求軍隊自給自足,但隨時間轉化,軍屯不敵勢宦侵占,日益民田化並趨於瓦解。<sup>24</sup>《明代的軍屯》寫作時,有時代和資料局限,僅能環繞軍屯作最大的延伸討論,事例稍顯短少。

後續鑽研明代衛所制度較詳盡者,有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和《衛 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兩書,前書運用地方志、 明代軍衛文冊、衛所選簿等史料,解釋明代軍戶來源、專有名詞、武職官兵

<sup>&</sup>lt;sup>21</sup> 劉謙,《明遼東鎮長城及防禦考》,頁 1-204。曹廷杰撰,叢佩遠、趙鳴岐編,《曹廷杰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上,〈西伯利東偏紀要〉,頁 62-145;〈東三省輿地圖說〉,頁 179-235。

<sup>&</sup>lt;sup>22</sup> 劉謙,《明遼東鎮長城及防禦考》,頁 205-234。

<sup>23</sup> 莊和峰,〈明長城山海關防區防禦體系與軍事聚落研究〉(天津:天津大學碩士 論文,2011),頁38-90。

<sup>24</sup>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

的世襲與勾選制度,和軍戶教育機構的利弊,內容多關注明前中期。結論是 軍戶制度發展到晚明時,明政府對武官、兵卒的管控都已經放鬆失序,在無 法因應戰爭的狀況下,募軍和武將私人家丁充實軍隊等做法出現,並取代衛 所制成為主力兵源。

《衛所、軍戶與軍役》一書則選擇江西作為主要的研究地區,探討當地軍制、經濟、社會三者間的關係,較王毓銓書用更多的明清會典、實錄、地方志等資料考證江西衛所之建制沿革、軍屯田和州縣的關聯,綜論明中期至清代的兩百多年間,江西衛所軍隊漸漸脫離國防本質,轉為支援漕河運輸、搬運工作人力來源的過程,並分別討論衛所的軍戶管理、法律事件和人口分布等議題。于志嘉對於兵員、餉額都考證精詳,據此論證衛所由單純負責軍事,轉變到兼納漕運、巡捕、軍器製造、雜役為主業的原因,並以許多事例解釋明代衛所法規的執行或改變。于氏這樣的研究方式,類同「衛所的地方史」,與劉謙的風格類似,也較具體,惟萬曆朝以後的事例較少。<sup>25</sup>

張金奎也有《明代衛所軍戶研究》一書探索明代軍事制度,架構類似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透過許多事例中歸納出當時軍戶的四大來源:從征、歸附、謫發、投充部分。張書選擇山西的大同鎮為對象,考察該衛所於糧餉和教育方面的狀況,史料多採自《明實錄》,亦如大多研究明代軍事史的著作一樣,提及開中法、軍屯、民運等糧餉相關措施,並關注明代軍餉日益貨幣化之趨勢,復以《祈門英才公租簿》等資料研究衛所軍戶的後勤保障,鑽研如經歷司管理軍戶、司法案件、差役簽撥等衛所組織的問題。<sup>26</sup>本書的論述方向遵循前人模式,研究重點仍在洪武至永樂年間(1368-1424)的衛所成形期,鮮少涉及晚明軍事。

至於明朝軍隊實質訓練的班軍制度,以彭勇《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 操班軍為中心》和《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兩 書研究最深入。京操班軍一書考訂班軍的定義,並以「輪番到北京三大營執 役的班軍」為討論主軸,逐章分析班軍自明初建立起,輪番上役、防守的制

<sup>26</sup> 張金奎,《明代衛所軍戶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

<sup>25</sup> 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衛所、軍戶 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度,並與于志嘉評斷江西衛所軍有近似的結論:明朝班軍管理不善,故至晚明時期,淪為工匠雜役之兵。彭勇有關邊操班軍的著作,則補充前一書忽略的其他地區班軍輪調動態,將明朝北疆分成遼東、薊州、保定、山西、宣大、陝西等六部分,討論邊操班軍制度及其提升戰力的訓練;他認為明朝主要是抽調內地軍隊,輪番戍守邊鎮要地,而宣德之後,邊防政策趨向內斂、收縮,對居住在長城邊的蒙古部落實行羈縻政策,因此,班軍制度轉而偏重在集中有限精銳,確保重點地區的防衛能力。<sup>27</sup>

彭書主要利用的史料為《明實錄》,引證頗多,除了圍繞「班軍輪調」 主軸,剖析每處邊鎮的地勢優缺和沿革,更引述陝西章姓班兵家庭飽受輪調 之苦的奏疏,作為論證依據。不過,彭氏兩書仍試圖全面通論明代北邊防禦 體制,另加入馬市、官員考核、軍餉、軍屯……等內容,較易模糊讀者對班 軍制度的注意力。班軍管理議題分散於各章,未作專章處理,班軍的月餉問 題亦未多提,稱為可惜。彭勇認為邊鎮班軍的訓練與戰鬥實力,比京營班軍 狀況好。明代的軍隊會因駐防地之不同,分成京城與長城沿線兩種,因駐防 地有別,同性質的軍隊,如同樣從事工兵業務的班軍,所負責的業務與待遇 也不盡相同。所以,同為明軍,內部等級、責任,仍有地域之別,這也是明 代軍事史可與地方史結合研究的原因。

關於明軍內部的管制問題,有曹循〈明代衛所軍政官述論〉一文,說明明代於宣德八年(1433)建立的衛所軍政官,負責管理所屬軍士及判署文案,解決冗員眾多和武官權責不清、素質不齊的問題。軍政官由巡按定期考選,突破明初武官世襲舊制,至晚明時已大致完成武官不在本籍任職的轉變。本文指出,軍政官的設立及考選,是明廷針對洪武時期衛所制度和選官層面弊端加以改造的結果,也是衛所由戰時軍隊編制向平時地方駐守體制的演變。該文試圖修正前人研究中的部分見解,如衛所直到清初才由世襲制改變為任命制,和軍戶在明後期多被世襲軍官役占為奴隸等。曹循並總結道,衛所官以考選的掌印、僉書等銜確定職務,以世襲與軍功升授指揮等銜表明官階,

<sup>&</sup>lt;sup>27</sup> 曹循,〈明代衛所軍政官述論〉,《史學月刊》,2012:12,頁 39-45。

是新舊制度融合一體的表現。28

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的考察方面,梁志勝的《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研究》是重要著作。本書利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百餘冊明代《武職選簿》,參照正史、官書、文集等史料,並運用了2001年出版的《中國明朝檔案總匯》,以十餘年時間完成,修正了諸如明代旗軍來源等不明之處,並指出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的優點在於因襲替寬鬆、體恤優厚,有利於武官建立穩定生活,並維持衛所軍制的建設,進而鞏固明朝政權。不過,梁志勝也說,武官人數膨脹,旗軍又以軍功列入世襲行列,益發使得軍費支出負擔沉重,對明朝衰亡有重大影響。<sup>29</sup>

同樣是軍事管理的方面,軍費亦是晚明軍事史的重要議題,稍早有楊永漢《論晚明遼餉收支》一書,繼有林美玲《晚明遼餉研究》、李華彥《財之時者:戶部尚書畢自嚴與晚明財稅(1628-1633)》和博士論文〈崇禎朝薊遼兵變與餉稅重整〉,及曾美芳的博士論文〈晚明戶部的戰時財政動作:以己巳之變為中心〉等著作,專注於晚明遼餉的收支問題,還有軍費來源和分配與明朝財稅制度間的關係。<sup>30</sup>這些著作已從檢視明朝軍費與鹽法、開中制度密切關聯的研究角度,逐漸轉移至探查晚明軍費本身的收支方式,及其對明朝原有財稅制度的衝擊;並關注到明清戰爭的局勢,已與明初建立軍事和財政制度時的背景不同,故須以實際收支數據和戰時軍需調度情形來理解晚明軍事上各方面的轉變。研究晚明軍事,更需結合遼東或長城內地的戰況,檢視晚明的軍隊組織和軍事管理,因此,明清鼎革之際的軍事史,也具有地方史的研究趨向。

<sup>28</sup> 彭勇,《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5);《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北京:中央民族 大學出版社,2009)。

<sup>2</sup> 深志勝,《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30 楊永漢,《論晚明遼餉收支》(臺北:天工書局,1998)。林美玲,《晚明遼餉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李華彥,《財之時者:戶部尚書畢自嚴與晚明財稅(1628-1633)》(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李華彥,〈崇禎朝薊遼兵變與餉稅重整〉(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曾美芳,〈晚明戶部的戰時財政動作:以己巳之變為中心〉(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

## 三、軍事後勤的多元化研究

傳統軍事史的研究,都會著重於兵員制度、城堡建設、戰爭時間和成果 等議題。然而,當所有史事在編年表格上逐漸填滿之後,便需要有不同的研 究角度,如戰爭的致勝方法、兵器技術、人員素質、管理方式等。

晚明時期,西方傳教士帶來新的西洋槍砲技術,深獲明朝君臣重視,將之應用於遼東戰爭中,對軍事產生很大的影響。黃一農教授早年對天主教傳華深感興趣,發現傳教士以科學技術作為傳教引子,意外引發部分士人熱衷研習,積極研發新戰具和戰法,而此一過程實值得深究。因此,他實地勘查多門古砲、戰場、碑刻和古籍,得出「兵變和火砲技術影響遼東明清勢力消長」的結論,並用多篇論文分析明朝原在火器上擁有優勢,也有外籍軍兵和傳教士提供技術上的指導與協助,女真人原無必勝把握。研究明朝學習西方火器及軍事技術之情況的論著,仍歸納出明清戰爭的勝負關鍵在於遼東人事,特別是出身遼東明兵的孔有德(1602-1652)等,在兵變後攜帶火器降金,才使局勢大為轉變。<sup>31</sup>此與前文提及明朝衛所軍隊最終不具戰力,或淪為匠役,多肇因於管理不善的論點類似。事實上,晚明丟失遼瀋後,山海關內外軍政由復興到衰落,以及糧餉始終分配不當以致引發兵變,是晚明軍事情勢發展的重要脈絡。

人事管理也是晚明軍事史值得發展的研究方向。明朝後期軍政人事變化的相關論著,有張哲郎的《明代巡撫研究》,該書考證出明代巡撫職共有36處,設廢時間不一,初期的巡撫職權也僅是短暫巡視地方軍務及政務,後因地方發展興盛,巡撫變成為晚明常設久駐之職,手上的軍事權力也隨各地局

<sup>31</sup> 黃一農,〈明清獨特複合金屬砲的興衰〉,《清華學報》,41:1(2011),頁73-136; 黃一農,〈明清之際紅夷大砲在東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81:4(2010),頁769-832;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 援華葡兵新考〉,《歷史研究》,5(2009),頁65-86;黄一農,〈明末薩爾滸 之役的潰敗與西洋火砲的引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3 (2008),頁377-413;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3(2004),頁573-634。

勢變化而加重。<sup>32</sup>張書主要以《明實錄》為依據,概要介紹各處巡撫來源、 演變、轄區和重要業務,其中有兩章重複列出36個巡撫職,再個別陳述,篇 幅甚長,對於巡撫的職掌和權力,闡述明確,容易掌握,是了解明代後期軍 事制度的重要參考書籍。

斯潤成《明朝總督巡撫轄區研究》,包含巡撫之上的總督,依各地督撫名稱條陳史料,列出其轄區演變,總結督撫制是明朝為加強中央集權而行。以此可知,明代的軍事設置,與鞏固皇帝政權的目標是一致的。<sup>33</sup>靳書考證過程中曾論及督撫官銜同時具有都察院監察的任務,可惜並未再擴充申論。該書附錄〈與督撫有關的明朝政區沿革簡表〉則頗具參考價值,靳氏以列表分類的方式整理軍事據點資料,簡明易懂,亦值得後續研究者仿效。另外,李方昊在其碩士論文〈明代文人對軍隊的統領論析〉的討論中,將明文人獲得各種提督、巡撫、管餉等軍事權力的過程分作五期,通論整個明代文官領軍的影響。<sup>34</sup>李氏論文的研究範圍過大,關注焦點較分散,但提出了一個值得重視的觀點:明初武人領軍日益轉向中後期由文人領軍,此潮流正面帶動文武臣良性互動、互相學習;不過,非軍伍出身的文臣是否能體察基層士兵的心理,則是還可多加研究的範圍。

軍費問題是研究軍事史必然觸及的議題,而明朝的軍事自始就與開中鹽 法等合併執行,晚明的遼餉更須與十五省財賦的徵收狀況一同理解。研究明 代後期財政的專論,以黃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及《十六世紀 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兩作最具開創性,前者評論明初財政體制根據太祖 所欲達到的低水準人造平衡而設計,其於制度上的缺陷,造成晚明財政紊亂 與拮据。<sup>35</sup>

黄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更深入指出明朝財稅 管理複雜、繁瑣,欠缺如現代的系統財管方法,導致國家財稅分配不均,不

<sup>32</sup> 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新潤成,《明朝總督巡撫轄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頁1-18、148-171。
李方昊,〈明代文人對軍隊的統領論析〉(哈爾濱: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2003), 頁 3-51。

<sup>35</sup> 黄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文 化實業公司,1988),頁199-219。

能發揮最大的運用效益。該書亦點出明朝中央集權在財政上的缺陷,包括強制田賦統一徵收、龐雜的稅則達到上千種、數字計算的需求非明代籌算技術所能因應、徵收水平過低且人手不足、法規百餘年不調整終致不敷使用、政府與工商業溝通不良且管理不彰,加上收入方面過度倚賴田賦,鹽政專賣亦缺乏競爭,又未因應中葉以後工商興起而另闢稅源,導致越到中後期,軍事財用越不足。<sup>36</sup>這些缺陷造成行政效率不彰,在講求精準迅捷的戰場,成為明軍長年欲振乏力的主因。

另一專著是賴建誠《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一書,直接以十五世紀之後的明代邊鎮軍費作為主題,通盤研究萬曆十年(1582)版《萬曆會計錄》,依其所載邊鎮軍馬錢糧年度預算,確立含永平鎮、密雲鎮、昌平鎮、易州鎮、固原(陝西)鎮在內的九邊十三鎮之數。<sup>37</sup>賴書參閱眾多明清經濟史和邊疆史專著,重視以數字說明事實,分項理出邊鎮糧餉與鹽政、権關等餉源的明確數字,據史料舉證、計算軍需,是研究明軍政者的必讀品。賴書首度提出嘉靖十年(1531)至萬曆三十年(1602)九邊軍鎮係採取「預算制」,並詳論軍鎮周邊的屯田、鹽法、民運漕運海運、年例銀、衛所官員俸糧、修城費用等議題,史事細節及人物論證簡潔,不落窠臼。惟作者自言本書重在考察明朝邊鎮糧餉的正常運作,故較少著墨萬曆三十年以後,因為明末軍事已屬不可救時期,耗費暴增非常態,即使研究有成果,也不能代表明朝制度。

張松梅〈明代軍隊餉銀供給演變探析〉則是整體回顧明朝軍隊餉銀來源 的屯田、開中鹽法等制度,估算長城九邊各衛所的士兵、支出軍用物品和銀 錢的數目。<sup>38</sup>張書花費很大篇幅敘述洪武、永樂兩朝制度,估計明中後期軍

36 黄仁宇著,阿風等譯,《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43-45、95-218、 358-378。關於明末財政與遼東戰爭的關係和明廷政策,參見李華彥,〈晚明戶部 尚書畢自嚴財經政策研究(1628-1633)〉(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2005)。

<sup>37</sup> 賴建誠,《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臺 北:中央研究院,2008),頁 4-86。固原鎮與陝西鎮二名實指同一地,參見趙現 海,〈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頁 126-127。

<sup>38</sup> 張松梅,〈明代軍隊餉銀供給演變探析〉(曲阜: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數則多沿用《明實錄》、《明經世文編》、《明會典》等資料,而對最重要的明末戶部會計紀錄《度支奏議》僅略引一些數字,也未說明晚明為軍餉所做的財政變革。至於對相關制度的評論,本書之見解實與黃仁宇、賴建誠等研究相去不遠。

軍事行動帶來的民族衝突、遷徙與融合,是西方學者研究明清鼎革時期較關心的面向。美國學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的專著*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研究最初女真人從努爾哈赤(1559-1626)的七部九姓,模仿明朝設置前線軍事據點以強化控制占領區,進而形成八旗制度,又經皇太極(1592-1643,1626-1643在位)易族名為滿洲,提出民族論述、仿明創設六部等政府組織,再進入帝國層級。順治帝(1638-1661,1643-1661在位)入關後則在各地布置據點,由八旗軍戍守,既保持滿漢民族不同化,又壓制漢人反叛。<sup>39</sup>本書鉅細靡遺討論滿清各方面,以平等地位看待明末遼東的多民族競逐,也給予晚明軍事史於「遼東」戰區的另一種觀察角度。他認為研究者宜將漢、滿、蒙、朝鮮四族在此地縱橫裨合關係的重要性,提升到朝代興衰之上,瞭解四族人民接觸後,彼此容舊納新的狀況,並探討遼東兵民在生存和種族兩大難題間作出的抉擇。

歐書的第二章詳論滿清從明朝處仿得軍事據點布置法,強化自身部族的軍事編制,並於1636年(崇禎九年)擴大設置朝鮮、蒙古地方據點,攻占大凌河,奠下入關基礎。定都北京後,滿族由北京起始,繼續推進,在江南、西安等19處建立主要據點,於漢城市中隔建滿城駐紮八旗軍。至乾隆初,滿人定居於近百個不同的戍衛區裡,監視漢人並保持滿族的體制、文化。這種軍事策略原本只是清初的權宜之計,但因戍衛區的漢人集體排斥滿人,而滿人又必須注意不被漢化,所以就沿續了下來。<sup>40</sup>歐氏指出明末強化的遼東軍事樣貌,擴大成為往後滿清兩百多年間以少數統治多數漢族的基本架構,故明末遼東一隅的人事物乃至制度,影響力遠在民變、盜匪、流寇之上。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3-73, 175-209, 275-361.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89-132.

美國學者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的專書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也注意到明清戰爭涉及多元民族的問題,並回顧了清朝崛起於遼東,到定三藩、收臺灣、平定全中國這七十多年間的歷史。導論和開頭三章通論明清對峙期的東亞情勢,惟講述女真人發展,多本於《清實錄》與前人研究。該書受成書年代早和資料所限,於崇禎時明清勢力的迅速消長,還有深入研究的空間。另外,本書對晚明抗金復遼、明財政耗損及關寧軍為餉兵變等事著墨很少,焦點亦集中於遼瀋、廣寧大戰和袁崇煥(1584-1630)、洪承疇(1593-1665)、吳三桂等名人身上,對於常民關注不多。41

另一位美國學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根據1970年代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一本新發現的清兵日記,寫成The Diary of a Manchu Soldi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Dzengseo, fl. 1680-1681一書,詳述清朝崛起、明清戰爭及八旗、綠營等制度。狄氏與達力扎布另合編有Manchu-Mongo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一書,將皇太極時期滿洲、蒙古兩族間的往來文書,及理藩院關於八旗組織的部分文件譯成英文,對歐美學界很有貢獻。<sup>42</sup>不過狄書與魏斐德書相同,對於明朝最後三十年投入遼東戰爭的建設、軍費,和官兵人事調度幾無著墨,較偏向研究清朝方面的發展,在理解這段東亞史上不無缺憾。

史料運用上,美國學者司徒琳編撰*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書,收錄有關明清競逐中原的許多史料,包含明末迄民國時期的各種文集、地方志、奏牘、論文、筆記等,極具應用價值,是研究明清交替時期歷史必參考之書。本書提出一個西方人的疑惑:何以直至二十世紀,漢人始終懷疑清朝入主中原的正統性?司徒教授建議研究者宜從清末文本瞭解問題,深入

<sup>41</sup>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224. 中譯:陳蘇鎮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頁 1-196。

<sup>&</sup>lt;sup>42</sup>Nicola Di Cosmo, trans. and ed., *The Diary of a Manchu Soldi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6), 1-45. Nicola Di Cosmo and Dalizhabu Bao, *Manchu-Mongo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 (Leiden: Brill, 2003).

漢人心中的想法,而非只著眼明末史料。<sup>43</sup>學者方秀潔 (Grace S. Fong) 引用司徒教授的看法,將目光移到明末清初江南漢人的日記、詩文集上,認為此時期的江南文人藉寫作抒發個人對亂世的感想,表達如何修正局勢的見解,並為自盡殉明的人作紀錄。方氏想從這些史料理解當時文人的想法,深探十七世紀改朝換代的東亞實況。<sup>44</sup>故嘗試用諸多事例,解讀明末清初漢人的心聲,是下一個可行的研究方向。

西方學界試著從民族角度、清朝文字獄和思想禁錮等方面,理解明末清 初漢人極力抵制滿洲入主中原的情況,卻也宜注意漢人希望藉文化優勢,使 異民族最終融入大一統思想內,同化於漢族的趨勢。明太祖(1328-1398, 1368-1398在位)以恢復中華傳統作號召,以漢人正統政權自我標榜,<sup>45</sup>明代兩 百多年來尊程朱正統,習孔孟禮教,別夷夏之防,加上禁止人民擅自交通外 族、出海,造就的認同標準深植民心,清人以胡服異俗、長年外敵身分驟入 中原稱帝,難免遭受質疑。

西方學界為避免受傳統大漢族主義思想左右,在研究明清鼎革之際的歷 史時,於觀點和解釋方式上修正頗多,亦從少數民族角度檢視東亞全局的變 化,這對於向來以明朝長居東亞強權地位,直到1644年仍主宰中國十五省的 主流解釋觀點而言,不啻增益研究的多元性。在文化上具有研究優勢的華人 學者,則可嘗試從明人角度,研究崇禎朝大型兵變的軍心變動,重建十七世 紀上半的薊遼戰時社會,論述明朝官民兵從同仇敵愾對付滿洲,到分批降金 的身分認同與意識形態轉換緣由。

司徒琳編纂的另一本專書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China in Tigers' Jaws, 選錄翻譯江南士人的詩文集,如嘉定劉尚友《定思小紀》、史可法殉國前幾封家書、揚州王秀楚《揚州十日記》、南京姚文熙《明季日記》等,說明江南士人幾經屠殺,向來不滿清軍,以詩文集抒發面對故國新朝的

<sup>&</sup>lt;sup>43</sup>Lynn A.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Ann Arb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1998), 1-5.

Grace S. Fong, "Writing from Experience: Personal Records of War and Disorder in Jiangnan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in Nicola Di Cosmo ed.,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57-277.

<sup>15</sup> 「明〕李景隆等修,《明太祖實錄》,恭 29,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條,頁 1。

兩難心境,審視這些融入個人豐富經驗和心緒的詩文。司徒教授在導論中認為這些詩文有別於中國書籍、文章向來少談及個人情感的傳統,更留下較能反映時局的記錄。又認為本書的選文提供了一些研究明清史的觀點,如:明文化實即江南文化,長城是明顯的文化區分線,牆外其他民族使得十七世紀中國史變得極為複雜,而該世紀天災人禍頻仍、氣候變冷、糧食減產、稅收短缺、政治衝突、社會騷亂、經濟紊亂、幣值不穩、疫病流行等禍患,還有來自東北的金聯盟(本書似乎不認為明末的金或女真族已形成可稱為「整體」的組織)及內地兵禍,均迫使人民鋌而走險,透過各種方式求生存。書中提到,二十世紀研究這段歷史的中國學者,多從愛國主義或士民必忠於王朝的觀點著手,較未注意到上述這些影響大時代甚鉅的複雜因素。46

司徒教授也提到,西方學界研究這段歷史有其局限,故選錄、翻譯、註 釋及介紹明清時期豐富的詩文材料是有必要的,這些作品呈現出的明清人物 情感部分,頗值得重視。在不過度強調感性的條件下,中外學者克服語言、 文字隔閡,從原始文本出發,落實歷史事實,將可使學界對明末清初的研究 有所突破。

晚明軍事史有許多基礎知識,可以從通論書得知。如明史研究的開創性著作,有美國學者牟復禮 (Frederick W. Mote)等人合著的《劍橋中國明代史》,其第九、十章對隆慶至崇禎朝的論述,深刻揭示明清交替時期的許多議題,如海外貿易、白銀產量與中國經濟的互相影響,滿洲持續入關劫掠、大凌河之役及兵變重創明軍勢力等,但限於篇幅,都只能點到即止。<sup>47</sup>晚明財稅和遼餉一體重整的關係,在明清史相關論著中,較未獲關注。《劍橋中國明代史》及牟復禮的書*Imperial China 900-1800*第二十六至三十章萬曆到崇禎朝等,多重視東林、閹黨之爭和社會、文化、科舉、民變等議題。<sup>48</sup>

Lynn A. Struve, trans. and ed., *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China in Tigers'*J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8.

<sup>&</sup>lt;sup>47</sup>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74-721. 中譯: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554-691。

<sup>&</sup>lt;sup>48</sup>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1, 574-640. 中譯本見頁 554-618。F.W.Mote, *Imperial* 

毛佩琦、王莉合著的《中國明代軍事史》,其特殊處在指出明代中期衛所制廢弛,全國性的大量募兵制興起,發展成末期產生吳三桂父子養家丁3,000名的狀況,應募者多為養家而來,所以軍餉在晚明政務上越形重要。本書是大型通論書,全無註釋,部分結論引證來源卻不多,如依據遼東抗金與關內民變狀況,評論萬曆到崇禎年間是「衰敗時期」,說理還可充實。49

回到明清對峙本身,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合著的《明清戰爭史略》,是明清戰爭最直接的通論書。本書分章解說兩國之間各場決定性戰役的經過,並於每章末評論雙方成敗之因,如薩爾滸戰役明軍敗因之一是將領怯懦無才、督撫彼此不合。本書認為每場重要戰爭,各代表女真在遼東的一次新進展,又分析明朝欲拉攏滿蒙各部落打擊努爾哈赤的策劃並不成功,軍事還是應根基於國力自強。本書主要根據《明清實錄》、《明史》、《三朝遼事實錄》和《明史紀事本末》等材料敘事,附錄〈明清(金)主要戰役一覽表〉亦很有參考價值。50

以上各著作,較未探討明清戰爭與財稅間的緊密關係,例如以明帝、戶部、薊遼軍隊三者為首的崇禎朝軍事和財政抗衡經過,財政原則由「量入為出」調整為「量出為入」的過程,以及薊遼戰爭主導晚明財政、稅收政策的制訂等層面,都是可繼續開發的研究領域。

### 四、晚明軍事史的研究展望

透過以上研究史回顧,可知晚明時期的軍事、糧餉與財政關係密不可分,應著重研究薊遼地區及其軍民和北京的互動,以解釋晚明財政、軍政因人際關係而起的變化。復遼活動是讓晚明長城九邊十三鎮串連一體進行調度的契機,支援遼東任務則使得整個邊鎮制度從中期的沉滯狀態活絡起來,將「邊鎮糧餉」結合薊遼戰場,更能看出明中期的邊鎮政策具體施行於九邊所產生的變革,而現況操作則可能改變原有制度。明亡前的三十餘年,遼東戰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54-810.

<sup>49</sup>年佩琦、王莉,《中國明代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119-172。

<sup>50</sup> 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明清戰爭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場涉及數十萬員各族官兵民,研究者應讓曾經存在於這個時空裡的人事物,回歸其應有的歷史地位,以補充前人著作之不足。明末清初七十餘年雖連年戰爭,但在歷史之長河中亦應視為常態,值得用微觀方式復原,這是明末清初軍事史重要且值得研究的原因。

前述明朝財政、邊政的研究,多有較為完整的統計分析結果,而晚明軍事變化則普遍未受關注。特別是遼東局勢的轉變、軍隊組成,較能展現明代軍事制度在現實世界裡的運作,也更能凸顯遼東和崇禎前期是明清易勢關鍵的原因。崇禎初期的戶部尚書畢自嚴(1569-1638),著有《度支奏議》119卷,是崇禎朝戶部出納全國財賦的奏疏總匯,裡面有當時軍政制度實際運轉的全面訊息,但前人研究主要仍是倚重《明實錄》,對於《度支奏議》只零星引用,其史料價值實值得後續研究者予以重視。

明朝財政和軍事的緊密結合,始自1550年代後對蒙古俺答、東南及朝鮮倭寇、遼東金軍連續用兵,終於清兵入關。此主題還可進行兩類研究:一是檢視明初的財政設計對晚明實際徵稅造成的困擾,二是由事例探察明朝制度的具體運作,釐清晚明財政和軍事制度因抗清作戰而改變的過程。明朝中前期,財政、軍事組織並行發展,晚明卻轉由戰爭主導財政制度、軍隊編制及其變革,甚至影響到時人恢復舊制的嘗試。明清戰爭顯示了明軍由鬆散衰弱到統整抗金的演進過程,可修正前人傾向通論整個明代,卻鮮少具體探討特殊時段的缺憾。此外,晚明長城兵員、軍餉的實際數字,未必如急求欠餉的明朝官兵們所稱的那麼多,故既有研究中的數字,還可進行更具體的估算,方可作為理解整體時代變動的依據。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明〕《明實錄·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縮編。
- 〔明〕《明實錄·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縮編。
- 〔明〕佚名,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部編,《崇禎存實疏鈔》,收入《明代基本史料叢刊,秦摺卷》,第 27-31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崇禎鈔本影印。
- [明]李輔等修,高鳳樓校勘,許麟英撰,《全遼志》,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2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據遼海叢書本排印。
- 〔明〕許論,《九邊圖論》,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21 冊,北京:北京 出版社,2000,據明天啟元年(1621)刻本影印。
- 〔明〕陳建撰,〔明〕高汝栻訂,〔明〕吳禎增刪,《皇明通紀法傳全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1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據明崇禎九年(1636)刻本影印。

#### 二、近人論著

- 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 于志嘉,《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 毛佩琦、王莉,《中國明代軍事史》,收入《中國全史》,第 1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王春瑜、杜婉言編著,《明代宦官與經濟史料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
-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司徒琳 (Lynn A. Struve) 著,李慶榮等譯,《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2。
- 年復禮(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編,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李方昊, 〈明代文人對軍隊的統領論析〉, 哈爾濱: 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 2003。

李治亭、林紅,《皇太極皇帝軼事》,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3。

李華彥,《財之時者:戶部尚書畢自嚴與晚明財稅(1628-1633)》,新北市: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2012。

李華彥,〈崇禎朝薊遼兵變與餉稅重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 文,2013。

杜家驥,《皇太極事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

肖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肖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林美玲,《晚明遼餉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周維強,〈明代佛郎機銃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周維強,〈明代戰車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南炳文,《南明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

范中義、王兆春、張文才、馮東禮,《明代軍事史》,收入《中國軍事通史》,第 15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范傳南,〈明代九邊京運年例銀及其經管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 論文,2011。

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明清戰爭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張金奎,《明代衛所軍戶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

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張松梅,《明代軍隊餉銀供給演變探析》,曲阜: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梁志勝,《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陳捷先,《皇太極寫真》,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

曹循、〈明代衛所軍政官述論〉、《史學月刊》、12(2012)、頁 39-45。

莊和峰,〈明長城山海關防區防禦體系與軍事聚落研究〉,天津:天津大學碩士論 文,2011。

彭勇,《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5。

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 出版社,2009。

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5:3(2004),頁 573-634。

黃一農,〈明末薩爾滸之役的潰敗與西洋火砲的引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79:3(2008),頁377-413。

黃一農, 〈明清之際紅夷大砲在東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響〉,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81:4(2010), 頁 769-832。

黃一農、〈明清獨特複合金屬砲的興衰〉、《清華學報》、新41:1(2011)、頁73-136。

黃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8),頁 199-219。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援華葡兵新考〉、《歷史研究》、5(2009)、頁 65-86。

曾美芳,〈晚明戶部的戰時財政動作:以己巳之變為中心〉,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

楊永漢,《論晚明遼餉收支》,臺北:天工書局,1998。

靳潤成,《明朝總督巡撫轄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趙現海,〈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

劉謙,《明遼東鎮長城及防禦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樊樹志,《晚明史(1573-1644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賴建誠,《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臺北: 中央研究院,2008。

閻崇年,《天命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

閻崇年,《袁崇煥傳》,北京:中華書局,2005。

閻崇年,《明亡清興六十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叢佩遠、趙鳴岐編,《曹廷杰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

Di Cosmo, Nicola, and Dalizhabu Bao. *Manchu-Mongo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 Leiden: Brill, 2003.

Di Cosmo, Nicola, trans. and ed. *The Diary of a Manchu Soldi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6.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Fairbank, John K.,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 The

-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Fong, Grace S. "Writing from Experience: Personal Records of War and Disorder in Jiangnan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in Nicola Di Cosmo ed.,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ote, F. W.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truve, Lynn A.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Ann Arbor: The Assi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1998.
- Struve, Lynn A. trans. and ed. *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China in Tigers' Jaw.*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Wakeman Jr., Frederic E.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154 • 李華彥 明代研究 第二十三期

#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Ming-Qing Change Era

Lee, Hua-yen

College of Liberal Education, Shu-Te University

There are two major trends in scholarships on the military system, weisuo (衛河). The first targets single aspects of the system, such as fortresses, conscription, or the use of horses in the military. The second trend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military through examining the subjects such as the origin of the Ming military 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nine garrisons" along the Great Wall. Recent trends tend to combine both approaches to give a holistic picture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 in a certain time period. Recently,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ends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At that time, the Ming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adjust both its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due to the wars with the emerging Qing. Supplemental provisioning for the military is another important them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is period. All of these areas are yet to be explored fully by researchers of Ming history.

**Keywords:**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the financial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the late Ming, research history